

规划遗产的本质辨析、内涵解读与特征识别*

张杨 何依

The Natur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nning Heritage

ZHANG Yang, HE Yi

Abstract: Planning heritage,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that combines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not only expands the types of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broadens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planning history. However,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blurs the natur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Taking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planning and heritage, the paper argues that planned heritage i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ideolog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which interac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It reflects the wisd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history and it embraces theoretical thoughts, design methods and system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planning heritage is the un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existence, of ideas and reality, of content and form, and of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Compared with the built heritage, the planning heritage reflects the role of planning in shaping the urban form,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and the tripartite unity in expression. Through the interplays between power and order, the coexistence of paradigm and forms, and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texts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planning heritage represents the unity of opposing side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kernel - representation", "prototype-type", and "focus - dislocation" defines the concept of planning heritage. By clarifying the natur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nned heritage, the paper paves the way for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Keywords: planning heritage; built heritage; essential attribute; 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typical features

规划遗产 (planning heritage) 被界定为一种蕴含规划智慧、见证历史进程、体现规划治理, 具有普遍价值的建成遗产^[1-2], 作为结合了“城乡规划学”与“文化遗产学”的交叉课题, 体现了对遗产体系中因规划而形成的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关注^[3-5]。当前, 国内外学者^[6-9]立足于规划学、遗产学、历史学、社会学、旅游科学等多学科视角, 对其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初步探索, 指出规划遗产的研究意义、目的与要点等相关问题。但是, 在研究奠基阶段, 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其本质问题的认知不清、内涵不明。因此, 有必要回到规划遗产的原点, 并在城乡规划学的视角下进行解读, 以明确这一遗产的特征所在。

1 规划遗产的本质辨析

规划遗产兼容了“规划”的价值和“遗产”的属性, 作为二者的结合, 兼具了双方

提要 “规划遗产”作为结合了城乡规划学和文化遗产学的交叉课题, 在扩展遗产类型的同时, 也拓宽了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路径。当下正处于这一研究课题的理论建构阶段, 多学科交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本质问题的认知不清、内涵不明, 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识别。研究从“规划”+“遗产”的复合性出发进行理论思辨, 认为规划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建成环境相互映射的产物, 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聚落空间营造的规划智慧, 即代表性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与制度体系, 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形成的建成遗产。两者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 是意识与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统一体。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相比, 规划遗产体现了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上下关联的存在方式、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通过权力与秩序的显隐互鉴、范式与形式的虚实相生、文本与作品的内外共进, 反映其“一体两面”的本质。从“内核—表征”的关联、“原型—类型”的推演、“意象—物象”的建构这三个维度, 进一步揭示规划遗产在制度、设计与理论层面的内涵。通过对规划遗产的本质、内涵与特征进行研究, 明确其概念层面的基本问题, 为后续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提供思考。

关键词 规划遗产; 建成遗产; 本质辨析; 内涵解读; 特征识别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20400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2)04-0035-08

作者简介

张杨,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 zhangmuyi@hust.edu.cn

何依,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授、博导, 通信作者, heyihust@163.com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于‘社会—空间’理论的宁绍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保护研究”(项目编号: 52078228)

的特质^[10-11]，需要对这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认识。

规划，作为一种可运用的手段，为特定的哲学认识、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提供服务。对于具体的规划目标而言，目标实现的过程是渐进的，需要持续地去做、不断地去实践^[12]。规划实践既包含了用理性的思考来追求合理的社会制度、美好的未来生活，又体现了用技术手段去协调城市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以持续创新的思想、知识与方法等学科体系推进城市科学发展、引导规划价值导向的正向演进^[13-14]。因此，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城市规划是一种意识形态导向下的社会实践，而那些可以被称作“科学”的内容，只是在实践中使空间有序化的一种“工艺”^[15]。回顾规划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权力意志向下城市空间的宏大叙事、功能主义影响下城市布局的职住分离，还是社会公平倡导资源共享的人民城市，都表现如此。

遗产，是具有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见证，反映人类在过去某个阶段的生活状态、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16-17]。例如工业遗产见证了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生产方式与技术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社会实践出发，反映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记忆遗产则通过文献保护，甄别历史事件，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作为历史的见证物，遗产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物质形式与文化意义紧密联系、实体遗存与周边环境整体相关^[18]，这是“遗产”区别“遗物”的重要属性。

从“规划”+“遗产”的复合性出发，可以发现规划遗产体现了意识形态在规划实践中的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表现为规划意识形成的规划智慧，包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制度体系等，另一方面则反映于建成遗产。其中，理论思想延伸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设计方法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制度体系保障了意识形态的实践秩序。作为一个完整的实践链条，三者相互影响，并通过建成遗产得到空间响应。

如何甄别那些具有规划价值的建成遗产，是对规划遗产进行本质辨析的关键。美国学者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与城市意义》(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一书中，指出了经规划的城市与未经规划的城市的区别(图1)，为规划遗产的价值识别提供了思考。第一类是经过规划、设计，或者说经“创造”而成的城市，这种城市在某个时刻被决定下来，其结构模式由主导的权力主体一次性确立，无一例外地表现为某种规则的几何图形。另一类城市是所谓的随机城市，也称作“生长而成的”“随机发生的”，通常在没有人设计的情况下产生，不受任何总体规划的制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根据土地与地形条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下逐步产生和形成^[19]。因此，作为规划遗产的建成环境，应经过规划、设计，或者说经创造而成，而非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发形成。虽然因建成环境的复杂性，很难将科斯托夫前述的两类城市进行完全分离，但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找出规划的存在方式，以及空间形式背后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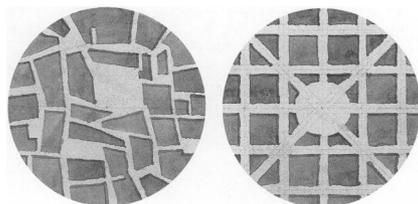


图1 随机型城市的不规则性和规划型城市的有序框架

Fig.1 The irregular geometry of random cities and the orderly framework of planning citie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只有具备规划价值的建成环境，才有可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一种规划遗产。建成遗产也只有作为规划理念的空间投射，才具有规划遗产的属性。以中国古代城市的中轴线为例，其通过“象天法地”获得了形式的合法性，集聚了城市的文化理想和精神境界。作为规划遗产的北京中轴线，体现了城市空间发展的总体纲要，包括精神“御道”、宇宙图示、永恒性、唯一性与可识别性、等级与秩序等^[20]——中轴线这一政治图形，是权力意识在城市空间的显现。另外，1858年巴塞罗那的老城扩建，通过一个精心计算的网格状新区，保证一半的住

房在早上获得日照，另一半的住房则在下午获得日照，每个街区中心的花园为富人和穷人共同享用，大规模相似性的街区模块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平民主义思想，是规划师塞尔达对欧洲早期城镇化的一个空间诠释，也是规划智慧与建成遗产相互映照后形成，且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产之一。

因此，规划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建成环境相互映射的产物，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聚落空间的营造智慧，即特定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与制度体系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形成的建成遗产。两者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是意识与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统一体。其中，作为建成遗产的部分，由于受到了某种规划理念的观照而成为有文化意义的空间(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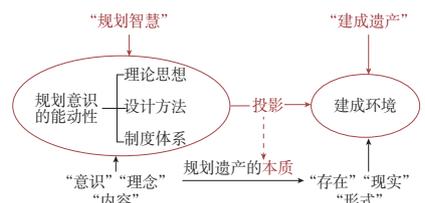


图2 规划遗产的本质：从“规划智慧”到“建成遗产”的空间投影

Fig.2 Essential attribute of planning heritage: spatial projection from "planning wisdom" to "built heritage"

2 规划遗产的内涵解读

2.1 权力与秩序的显隐互鉴

秩序受到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21]。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意识主导了规划、建设与发展方向，作为一种隐性的、幕后的控制力量，通过规划实践创造了显性的、可视的城市秩序。权力与秩序这一对关系展现了从“意识”到“存在”的空间映射。

权力“制造”了城市，城市作为权力的中心及其场所，这一点无须论证。城市产生的理由和目的，乃是给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场所^[22]。权力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投影，形成了特定的秩序，塑造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规划遗产。Wheatley^[23]在他的《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特征及特点初探》(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中, 将这一秩序视为礼仪体制的城市特征, 其调和天地人神关系, 提供符号性感应空间。Kostof^[19]也说过“中国的规划者们毫无例外地通过强调南北轴线(即利用子午线)来布置都城, 这种做法与一种统治者在宇宙中位置的思想体系相对应”, 隐喻了“权力的空间”及“空间的权力”。

轴线一直被视为象征权力的空间语言, 是秩序得以显示的载体之一。以现代主义城市巴西利亚为例, 政府试图通过轴线破旧立新, 在200 m宽的林荫道两边, 对所有建筑进行相同的板楼式设计, 并在压轴位置布置了两个半球体。其中, 仰口向上的半球, 象征众议院广泛听取意见; 覆口向下的半球, 象征参议院最后拍板定案, 以强调象征意义上的平等性。秩序隐含了权力, 权力彰显了秩序, 权力与秩序在巴西利亚这一规划遗产中获得了现实印证。

除了宏大叙事的政治轴线外, 大量中心集市的规划设计, 也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秩序与权力的关系。较于中心宫殿象征着国王的政治权力、中心教堂象征着教权的统治地位, 中心集市这类空间, 象征着市民阶层的力量。德国学者希马赫将中世纪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三大支撑元素(教会、贵族与议会)看作是集市广场^①乃至整个城市的空间构成动力(图3), 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城市中, 集市广场、市政厅与教堂都是共生状态, 三者

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中心^[25]。例如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的集市教堂, 其修建于14世纪, 与附近的旧市政厅等北德哥特式建筑一起, 共同建构了城市中心的权力话语体系。与之类似, 德国黑森州首府城市威斯巴登的老市政厅, 位于老城区的集市广场, 邻近威斯巴登集市教堂, 三位一体展现了权力交织下紧凑的城市机能。在权力导向下, 日常生活的秩序得以建构, 秩序与权力的显隐互鉴在此得到新的诠释。

制度赋予权力、安排了城市空间、影响了空间秩序的形成。因此, 权力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的产物, 秩序的转变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更迭, 二者统筹于制度演进的过程。在中世纪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之中, 城市规划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工具, 大量规划设计的经验被当时的权力主体所抛弃, 特别是尺度感和住宅与街道之间的亲密关系^[26]。在这之后, 大量与布鲁塞尔老城相似的、符合步行尺度的传统街道, 转变为以17世纪罗马城为代表的宽阔街区。近人视角下的街道尺度这一沿袭多年且影响广泛的规划遗产, 在中世纪城镇和街区规划中“失语”并“遁形”。因权力主体、意识与形态的更迭, 城市规划设计的经验与智慧, 往往被局限于特定的时空范畴^②, 从而导致空间秩序的转变。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亦是如此, 例如北宋时期, 从里坊制到街巷制的市制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在民众与政府长期的空间博弈和政策斡旋中不断演进的结果。在此期间, 宋廷就“侵街”问题颁布了大量政策文件, 对其进行规范, 直至北宋中叶, 才彻底放开, 引发了古典市坊规划制度的崩溃与瓦解, 开放街区与商业街道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27]。这一现象作为北宋时期的规划遗产, 在《清明上河图》中被真实地记录。

在规划遗产中, 控扼空间秩序的权力形态是内置的、隐藏的, 通过秩序得以显现, 但直接影响着空间秩序的形成^[28], 两者相互关联、内外锚固、显隐互鉴, 是建成环境内在的空间密码。其中, 权力是秩序的内核、秩序是权力的表征, 二者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 以“内核—表征”这对关系揭示了规划遗产的制度内涵^③。

2.2 范式与形式的虚实相生

规划设计的范式^④指代抽象的结构或标准, 如模数、指标、定额、比例、尺度等空间建构的模式语言; 而形式是具象的、真实的, 可被直观感知。在整体层面而言, 范式是形式的高度凝练, 形式是范式的形象表达, 二者作为规划遗产形成过程中的“源”与“流”, 虚实相关, 展现了从“理念”到“现实”的空间映射。

在规划遗产的形成过程中, 范式是其基本构型。中国古代的都城形制基本遵循了《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划范式, 其门墙、宫墙、城墙、道路的尺度、数量大多符合城邑建设的规定^[29]。大量地方治所城市的规划设计中也存在这一基本范式, 并以此控扼城池的规模、形制和格局^[30]。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古代城市, 通过等级差异、方位规制、要素配制等, 各级治所城市均严格地与其行政层级相对应, 把层级制官僚体系物化为一个整齐有序的城市体系, 从而使城市体系成为权力体系的化身, 并以礼制为内在的精神法则, 形成城市空间的规划法则。

因此, 对于规划遗产内涵的解读, 需要认识到形式与范式的关系, 并进一步从具象形式中剥离出抽象范式, 探索从“理念”到“现实”的映射路径。以欧洲古代城市为例, 其早期的城市规划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 形成了以数理为基础的规划范式, 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城市, 规划设计被锁定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中。如建立于1337年的佛罗伦萨新城特拉诺瓦, 设计者有意识地运用数理艺术创造新的城市空间, 其街块网格表现出一种进深递减的几何特征。这一特征来自于和圆内弦长相对应的三角数据表, 通过在平面上的4个方形分别做内切圆, 然后给各内切圆做间隔15°的半径, 就可以找到这种几何特征的来源^[19](图4)。从工业革命时期以花园城市为代表的几何城市, 到现代主义城市昌迪加尔的8000 m×1200 m (0.5 mile×0.75 mile) 的巨型街块, 具象的城市形式背后均有一个抽象的范式。

从类型学出发, 抽象范式与具象形式的关系中存在一个原型的问题。阿尔多·罗西将原型这一概念定义为: 某种经久和复杂的事物, 先于形式且构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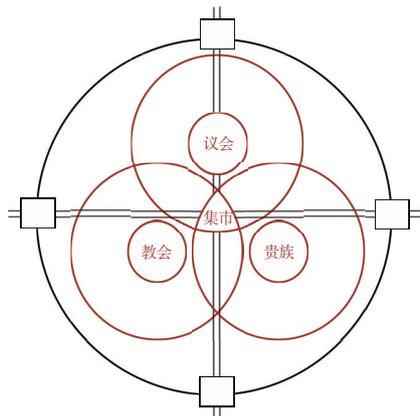


图3 中世纪的城市机能: 权力交织

Fig.3 Urban function in the Middle Ages: interweaving of power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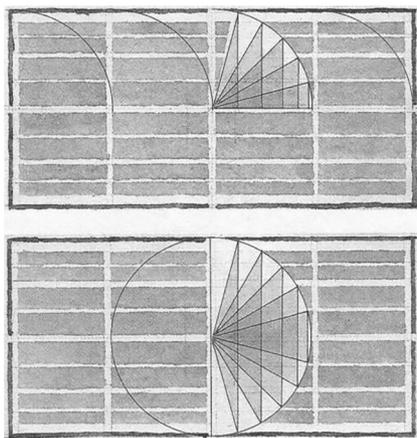


图4 特拉诺瓦规划设计中的几何特征
Fig.4 Geometric features in Terranova planning and desig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式的逻辑原则^[31]。结合规划遗产的内涵,可以发现,范式体现在原型的概念中,城市形态的意义依赖于那些早已建立的原型。作为设计的产物,范式和形式反映了规划遗产“一体两面”的本质,并在“原型—类型”的推演中,展现了其设计层面的内涵。

2.3 文本与作品的内外共进

“文本”与“作品”是接受美学中的两个概念。其中,“文本”是一种具有潜在含义的文字实体,它的意义是内置、不变的,在经过读者阅读检验后,才可能真正成为构成意义整体的审美美学,即“作品”^[32]。从“文本”到“作品”的转变,其实是文字信息的显示过程,这一过程耦合了作者的视界与读者的视界,揭示了二者的认知差异。

将这一对概念引入规划遗产领域进行思考,可以发现规划遗产中的“作品”,即有价值、有意义、有显示度的空间,来源于规划“文本”(这一“文本”包括作为规划成果的文本但不限于此)的投影,如各类计划、愿景、蓝图、典籍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规范(法令、规定、条例、办法)、社会共识(宪章、宣言、决议、建议)等^[33]。规划“文本”承载了典型的规划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具有突出地位与价值。例如提出功能分区的《雅典宪章》(1933年发布)、提出将文物本体和相关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的《威尼斯宪章》(1964年发布)、奠定“历史保护区”理

论思想的《马尔罗法令》(法国于1962年颁布)、奠定了“都市复兴”发展理念的《1949年住房法案》(美国于1949年颁布)等。

然而,“文本”只是规划遗产的一个维度,只有实现“文本”的空间化,才反映了规划遗产的整体意义。以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首都计划》为例,这一隐喻着民族主义思想的规划蓝图标志着中国首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34-35]。以此为基础,当局在1927—1937年间对南京进行了初期建设,迅速建成了一批城市干道和标志性建筑。虽因时局和经费问题,该计划只有部分得以实施,但其建成的部分例如玄武湖公园、中山陵园等城市公园体系^[36],在当下仍有迹可循,为南京的城市建设留下了可持续的规划遗产。

《首都计划》及相应的实践探索不是单纯的规划思想空间化,更重要的是,其反映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空间映射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偏差源于对“文本”的不完全解读,具体则表现为规划蓝图的不完全实施,反映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完全投影。在规划建设进程中,往往因客观条件的制约或主观意志的转移,“规划”与“建成”两个过程很难精准对焦,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作为一项规划遗产的价值。相反,正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干预,才使得从“文本”到“作品”的映射中,蕴含了当时规划编制、实施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规划史信息,产生了更多元的价值、更立体的认知。

“文本”和“作品”这一组概念,在引入规划遗产后,不仅附加了空间的意象,实现了由“纸面”、“图面”至“地面”的升维,展示了其“一体两面”的本质。同时,也体现了客观环境对规划实践的影响,展示了从意象转化为物象的丰富价值,反映了规划遗产的思想内涵——不仅在于规划思想空间化的结果,更在于规划思想空间化的过程。

2.4 小结

规划遗产的三层内涵体现了意识与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的一体

两面,展示了从规划智慧到建成遗产的映射路径。需要明确的是,这三层规划遗产的内涵,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存在,在典型的规划遗产案例中,往往既体现了理论思想、设计方法的指导,也有制度体系的介入,权力与秩序、范式与形式、文本与作品集体出现。如何在建成遗产中寻找它们的存在和表达,是识别规划遗产的关键。

以《周礼·考工记·匠人》为例,其以“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规划范式,对古代都城的基本形式进行了规定。其中,象征政权、神权、族权的朝堂、社稷坛、祖庙,与皇城一齐挤扼了城市的中心,并进一步影响了空间、社会与经济秩序。就具体的规划实践而言,这一普适性的营城逻辑,以礼制思想,中心、边界与轴线关系等都城设计方法,以及各司其职的营城制度^[37],指导了元大都、明清北京等典型都城的规划建设(图5),在中国乃至泛东亚地区都有广泛影响。

近现代同样存在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产,在形成过程中也展现了秩序与权力的显隐互鉴、形式与范式的虚实相生、文本与作品的内外共进。以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为例,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国家根据总体的战略部署,自上而下地安排城市各项工作,并以此为导向编制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嵌套、紧密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央权力是一切城市规划与建设活动方针的来源。研究发现:在条块分割、体系封闭的管理思想下,形成了国家配置社会资源的树形结构,产生了以单位大院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单元;在经济适用、兼顾美观的设计思想下,形成了以点轴布局展示城市形象的设计方法,塑造了以形象轴线为代表的“宽路—大街”形态;在生产优先、工业主导的发展思想下,采取了以定额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规划方法,并进一步形成了以工业片区为主体的“生产—生活”结构^[38]。全国各地以此为背景,在当时规划设计了一大批结构相似的单位大院、具有地标属性的城市形象轴线以及簇群分布的工业组团,体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思想影响空间、设计塑造空间、制度安排空间

的路径(图6)。

3 规划遗产的特征识别

3.1 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

在本质辨析和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规划遗产的特征进行识别。规划遗产体现了一种以规划而非建设所引导的演进模式,从而对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可持续的建构意义。这一演进模式首先,体现了规划意识的引导作用——早期的营建活动引发了人类的规划思考,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空间建构,以朴素、简单的营造理念、组织分工和工序工法指导规划设计^[39];其次,是历史的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念、工法和组织上升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思想、具有借鉴意义的设计方法,或是成为稳定、高效的制度系统,并凝练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规划智慧;最后,是实践的检验——通过规划思想的指导、设计方法的加持与制度体系的保障,规划智慧得以在现实空间中进行实践检验,并在时空进程中承载历史价值,从而成为某种规划意识引导所形成的建成遗产(图7)。

建成遗产是经由建造方式所形成的建筑、聚落、景观等遗产本体及历史环境的总称,其保护价值今已成为全球共识^[40-41]。在建成遗产这一概念中,“建造”与“遗存”是概念核心,相关研究也聚焦于“建造→遗存”这一阶段,对建成之后至当下阶段的存在、发展与保护状况进行思考,探讨“历史的当下”和“过去的未来”等相关问题^[42-43]。相比之下,规划遗产的生命周期历经“规划→建造→遗存”等阶段,实现了从规划意识到实际行动,再到建成环境的过程全覆盖。较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规划→建造”的过程是规划遗产的核心,规划意识与理念如何引导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一问题,成为规划遗产与其他类型遗产相比,最为特殊的所在。

3.2 上下关联的存在方式

在存在方式层面,规划遗产体现了上下关联的特征。“上”即作为规划的“道”^⑤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和制度体系,其统筹于规划实践这一过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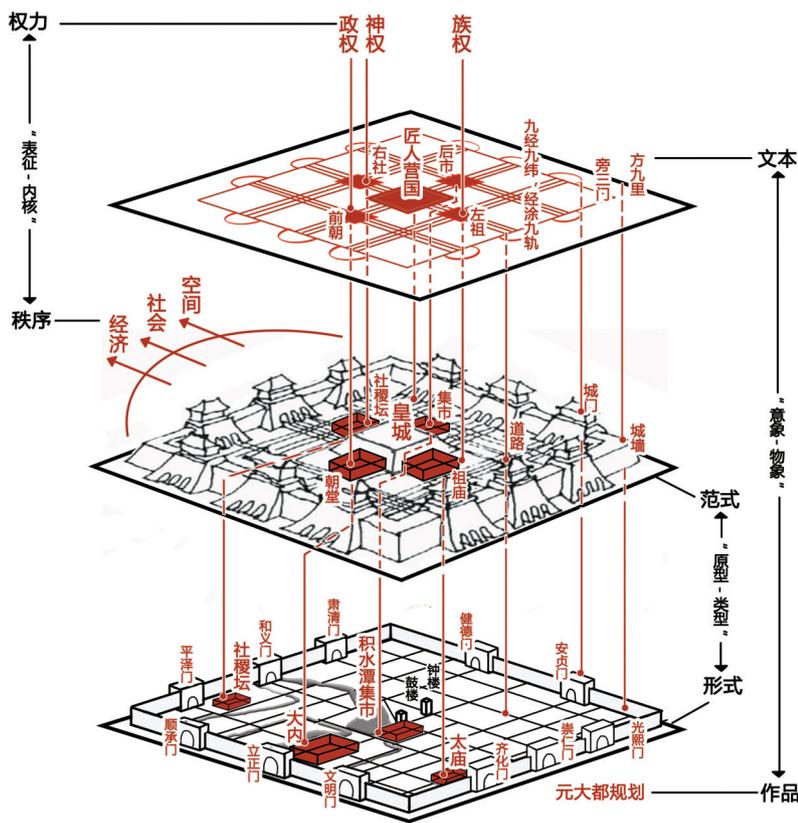


图5 《周礼·考工记》中所体现的规划遗产内涵
Fig.5 The connotation of planning heritage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Zhou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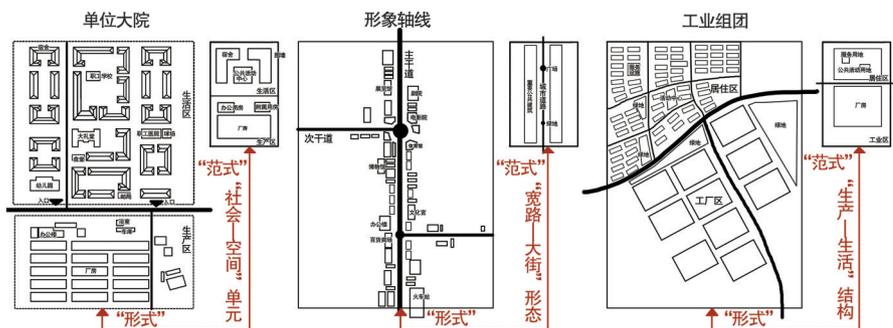


图6 计划经济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产
Fig.6 Representative planning heritage in the central planning era

指的是作为“器”的建成遗产,反映于各类历史环境。两者通过上下关联的方式,联合了理论与实际,整体诠释了规划遗产的价值。

以田园城市的理论实践为例,可以发现“上下关联”在规划遗产中的存在与表达。霍华德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在现有大城市之外的农村地带建立人口和用地规模都有明确限定的新城,并以

“寓乡于市”“寓工于农”的新型“乡市”按一定间隔,形成所谓“社会城市”^[44]。1903年,在伦敦北部赫德福德郡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进行了田园城市理论的实践检验。这座建于1903年的历史城镇作为承载田园城市思想的前驱,至今存在近120年,已然成为一处具有代表性的规划遗产,理论建构与实践建设在规划遗产的“上下关联”中实现了整合。

整体而言，规划遗产既有内涵的存在，也有表征的体现，道器相承。较于其他类型的建成遗产侧重于对实体与环境的关注，规划遗产的内容和层次更为丰富（图8）。

3.3 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层面，规划遗产将建设与保护两个过程统筹为一个整体，体现了三位一体的主客体关系：城市营建主体、价值认知主体、客体的建成环境，蕴含双向的价值。

建设与保护是一项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前者与需求相关，后者和品位相关^[45]。就保护而言，受保护对象的“意义”在被主体认知或诠释时才具有显性的价值，作为在观察主体意识中生成的景象，客体的意义被主体创造、依赖于主体而显示，并与主体的观念与视界紧密关联^[46-47]，这是普遍意义上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方式。但是，在规划遗产中，不仅存在对客体价值进行价值解读的认知主体，还包括对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的营建主体。城市营建主体和价值认知主体围绕着建成环境这一客体，分别在“建成之前”与“建成之后”的两个阶段发挥作用，因此其价值形式是双向的——“规划”赋予的价值，以及作为“遗产”所承载的价值。

相对于其他类型建成遗产以保护为目的、以建成环境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为导向^[48]，聚焦于遗产客体与价值认知主体之间的关系，规划遗产不仅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具有遗产价值，同时也隐含了城市营建主体（规划部门、组织、人员等）建构城乡环境的规划智慧。因此，对于规划遗产的研究，不仅需要站在遗产保护的视角进行价值识别，还需要立足城乡规划历史的视角，对特定时期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时代背景、政策环境，以及该规划所采用的理论思想、设计方法、制度体系，甚至规划者的教育经历、从业背景等进行溯源^[49]，以还原其空间建构历史中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图9）。

4 结语

规划遗产作为建成遗产背后那些有意义的建成环境，是特定的理论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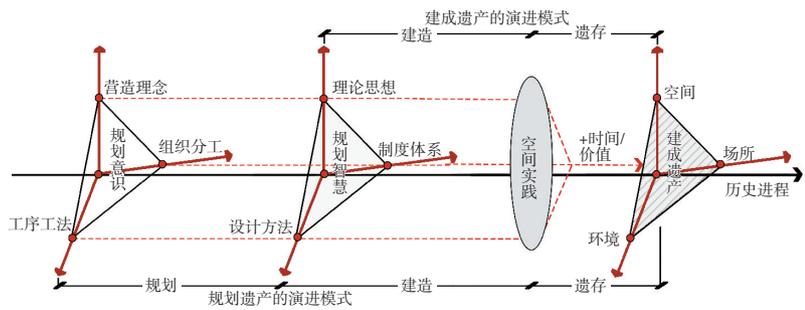


图7 规划遗产：规划引导的演进模式

Fig.7 Planning heritage: changing mode of conscious guid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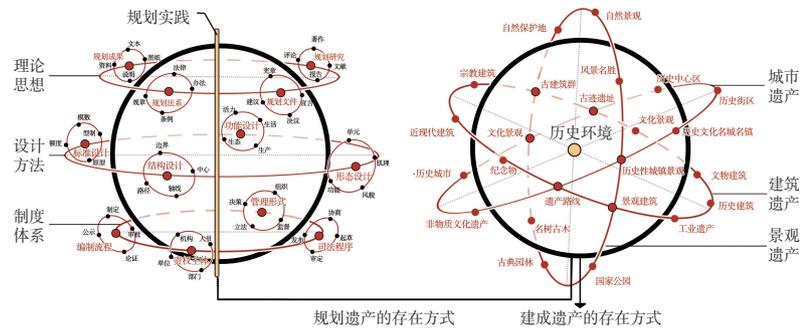


图8 规划遗产：上下关联的存在方式

Fig.8 Planning herita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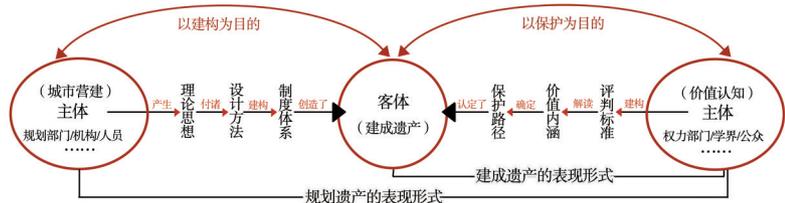


图9 规划遗产：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Fig.9 Planning heritage: the tripartite unity

设计方法与制度体系等规划智慧，在经过规划实践后，投影在城乡空间中所形成的建成遗产。规划智慧与建成遗产作为规划遗产的一体两面，是意识与存在、理念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统一体。作为一项交叉课题，规划遗产仍有大量内容亟待研究，如何立足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其价值形态问题进行思考，并就保护实践问题进行多样本的纵深及横向对比，需要进一步论证。

注释

① 集市贸易是中世纪欧洲进行商品交换的一

种重要形式，对推动特定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其组织和管理的权力往往被多个权力主体竞争。

- ② 布莱克韦尔在认识论中提出“经验以及可利用的积累证据，都是局限于相对狭窄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的^[50]”。
- ③ 内涵指代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解读规划遗产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阐释其“一体两面”的本质。
- ④ 范式一词由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首先提出，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申为规范、模式、范例等，被认为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式^[51]。
- ⑤ 《周易·系辞上》认为法则是无形的，称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称为形而下。形而上的东西先于并决定形而下的东西^[52]。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叶亚乐, 李百浩, 武廷海. 国际上规划遗产的不同概念和相应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2): 82-87. (YE Yale, LI Baihao, WU Tinghai. Concepts of planning heritage and corresponding practice in the world[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2): 82-87.)
- [2] 武廷海. 元大都齐政楼与钟鼓楼研究: 兼论钟鼓楼地区规划遗产价值[J]. 人类居住, 2020(3): 55-61. (WU Tinghai. Study on Qizheng tower, bell tower and drum tower in Yuan Dadu: revealing the value of the district as a planning heritage site[J]. Human Settlements, 2020(3): 55-61.)
- [3] 邹涵. “城乡规划遗产”概念辨析及相关问题初探[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 4(11): 120-124. (ZOU Han.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and related issues of urban planning heritage[J]. Study o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19, 4(11): 120-124.)
- [4] PINNEGAR S, FREESTONE R. Identifying Australian sites of urban planning heritag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web-based survey[J]. Australian Planner, 2007(4): 36-43.
- [5] JONES D. Validating planning heritage: evidence and reasoning for national heritage recognition of the city of adelaide plan and park lands[C].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 2010.
- [6] REATA G. The Italian way: urban planning heritage in Albani[J].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11): 19-23.
- [7] TAYLOR R, COX M, DICKINS I. Britain's planning heritage[M]. London: Croom Helm, 1975.
- [8] CHIGUDU A, CHAVUNDUKA C. The tale of two capital cities: the effects of urbanisation and spatial planning heritage in Zimbabwe and Zambia[J]. Urban Forum, 2021(32): 33-47.
- [9] NAKAJIMA N, TSUTSUMI T, SANO H, et al. Recent selections of “planning heritages” in USA and Australia[J]. AIJ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2015, 21(48): 789-794.
- [10] ERBEY S, YENEN Z. Contribution of the planning heritage in Anatolia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C]. IPHS Yokohama: Looking at the World History of Planning, 2018.
- [11] TAYLOR K. Urban nation: Australia's planning herit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1, 17(2): 193-194.
- [12] 孙施文. 规划的本质意义及其困境[J]. 城市规划学刊, 1999(2): 6-9. (SUN Shiwen. The essential significance and dilemma of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1999(2): 6-9.)
- [13] 吴志强. “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6): 7-12. (WU Zhiqiang. The future of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from perspective of Habitat II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6): 7-12.)
- [14] 王凯, 徐泽. 重大规划项目视角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演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2): 12-23. (WANG Kai, XU Ze.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urban planning: a perspective of influential planning practic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2): 12-23.)
- [15] 马武定. 城市规划本质的回归[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1): 16-20. (MA Wuding.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urban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5(1): 16-20.)
- [16] 单霁翔.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J]. 城市规划, 2007(5): 9-23. (SHAN Jixiang.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it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7(5): 9-23.)
- [17] 肖建莉, 越剑. 模式转型期中国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复兴: 以贵州云峰屯堡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4): 70-78. (XIAO Jianli, YUE Jia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vival of chinese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ode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ake Yunfeng Tunpu,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4): 70-78.)
- [18] 阳建强. 基于文化生态及复杂系统的城乡文化遗产保护[J]. 城市规划, 2016, 40(4): 103-109. (YANG Jianqiang. Prot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ecology and complex system[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4): 103-109.)
- [19] KOSTOF S.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M].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 [20] 范嗣斌, 邓东, 朱子瑜. 北京传统城市中轴线九大特质解析[J]. 城市规划, 2003(4): 45-47. (FAN Sibin, DENG Dong, ZHU Ziyu. Analysis of n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axis of Beijing's traditional cit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4): 45-47.)
- [21] 何兴华. 空间秩序中的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J]. 城市规划, 2003(10): 6-12. (HE Xinhua. Interest pattern and power structure in spatial order[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3(10): 6-12.)
- [22] 鲁西奇, 马剑. 空间与权力: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J]. 江汉论坛, 2009(4): 81-88. (LU Xiqi, MA Jian. Space and power: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urban form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a[J]. Jiangnan Forum, 2009(4): 81-88.)
- [23] WHEATLEY P.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M].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1971.
- [24] SCHIRMACHER E. Satdvtvorstellung: die gestalt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e: erhaltung und planendes handeln[M]. Zuerich/München, 1988. (SCHIRMACHER E. Medieval urban form: conservation and planning operations[M]. Zuerich/München, 1988.)
- [25] 蔡永洁. 空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空间: 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的社会学观察[J]. 建筑学报, 2006(6): 38-42. (CAI Yongjie. The right of space and the space of power: a soci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uropean city squares[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06(6): 38-42.)
- [26] 吉伯德. 市镇设计[M]. 程里尧,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3. (GIBBARD F, et al. Urban design[M]. CHENG Liyao,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3.)
- [27] 张杨, 何依. 历史图景中的非正规城市形态及当代启示: 基于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J]. 城市规划, 2021, 45(11): 83-95. (ZHANG Yang, HE Yi. Informal urban form in historical prospect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Qingming Shanghe T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1): 83-95.)
- [28] 瑟吉·沙拉特. 城市与形态: 关于可持续城市化的研究[M]. 阳陆,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SALAT S. Cities and forms on sustainable urbanism[M]. LU Yang.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1.)
- [29] 焦泽阳. 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1): 114-118. (JIAO Zeya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itual ethics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national engineering for capital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n the capital urban form in ancient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1): 114-118.)
- [30] 尹泽凯, 张玉坤, 谭立峰.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模数制”探析: 以明代海防卫所聚落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4): 111-117. (YIN Zekai, ZHANG Yुकun, TAN Lifeng. A study on the modular system in China's ancient urban planning: taking the coastal defense forts of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4): 111-117.)
- [31] 何依, 邓巍. 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肌理

- 的原型、演化与类型识别[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3): 97-103. (HE Yi, DENG Wei. Prototypes, evolu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texture in Nanhuamen historic district[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3): 97-103.)
- [32] 钱翰. 从作品到文本: 对“文本”概念的梳理[J]. 甘肃社会科学, 2010(1): 37-41. (QIAN Han. From works to texts: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texts” [J]. Gansu Social Science, 2010(1): 37-41.)
- [33] 张杨. 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遗产”: 概念界定、体系建构及案例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21. (ZHANG Yang. “Planning heritage” in planned economy: concept defini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ase study[D].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 [34] 董佳.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首都计划》: 一个民国首都的规划与政治[J]. 城市规划, 2012, 36(8): 14-19. (DONG Jia. Capital plan of Nanjing dur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ime: planning and politics of capital c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2, 36(8): 14-19.)
- [35] 郭建.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文化研究[D].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GUO Jian. A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the early-modern city planning of China[D].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8.)
- [36] 王智勇, 李纯, 孙新旺. 民国南京《首都计划》中公园系统规划的解读、评价及启示[J]. 中国园林, 2017, 33(11): 81-86. (WANG Zhiyong, LI Chun, SUN Xinwang.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park system planning in Nanjing Capital Plan[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7, 33(11): 81-86.)
- [37] 孙施文. 《周礼》中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J]. 城市规划, 2012, 36(8): 9-13+31. (SUN Shiwen. Ancient city planning system of China in *Zhou Li*[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8): 9-13+31.)
- [38] 张杨, 何依. 计划经济时期的规划理性: 思想、方法与空间[J]. 规划师, 2022, 38(2): 40-47. (ZHANG Yang, HE Yi. Planning rationality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thoughts, methods and space[J]. Planners, 2022, 38(2): 40-47.)
- [39] 郭璐. 中国早期都邑规划中的“位”[J]. 城市规划, 2021, 45(12): 77-83. (GUO Lu. “WEI” in the city planning of early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2): 77-83.)
- [40] 常青. 传统聚落古今观: 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J]. 建筑学报, 2019(12): 14-19. (CHANG Q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from ancient to now: commemorating the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019(12): 14-19.)
- [41] 张松. 城市生活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建设的理念及路径: 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实践的经验与挑战[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6): 100-108. (ZHANG Song. The idea and path of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preserving the urban living heritage: Shanghai’s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in historic townscape preserv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6): 100-108.)
- [42] 常青. 过去的未来: 关于建成遗产问题的批判性认知与实践[J]. 建筑学报, 2018(4): 8-12. (CHANG Qing. Future of the past: critical review and practice of the built heritage[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8(4): 8-12.)
- [43] 冷天. 历史的当下: 遗产保护实践下近代史研究反思[J]. 建筑师, 2020(1): 134-140. (LENG Tian. Toward a historical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J]. The Architect, 2020(1): 134-140.)
- [44] 刘亦师. 田园城市思想、实践之反思与批判(1901—1961)[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2): 110-118. (LIU Yishi. Critical reflections of the Garden City idea and practices in the west, 1901-1961.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2): 110-118.)
- [45] VINAS S M. Contemporary theory of conservation[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4.
- [46] 顿明明, 赵民. 城乡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主体”辨识及政策启示: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探讨[J]. 城市规划, 2016, 40(6): 74-81. (DUN Mingming, ZHAO M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in actor” and implication for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6): 74-81.)
- [47] 肖竞, 李和平, 曹珂. 历史城镇“景观—文化”构成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J]. 城市规划, 2016, 40(12): 81-90. (XIAO Jing, LI Heping, CAO Ke.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landscape media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China’s historic towns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6, 40(12): 81-90.)
- [48] 王鲁民, 段建强. 质感存真: 陈从周园林修复理念与城市建成遗产保护[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5): 114-117. (WANG Lumin, DUAN Jianqiang. Physical quality resides in authenticity: Chen Congzhou’s thinking on garden restor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urban built herita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8(5): 114-117.)
- [49] 李浩. 首都北京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考察: 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评述[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4): 96-103. (LI Hao.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Beijing master plan: a commentary of the *Draft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Beijing in 1953*[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4): 96-103.)
- [50] CILLIER P.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 理解复杂系统[M]. 曾国屏,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CILLIER P. 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M]. ZENG Guopin,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 2006.)
- [51] 张庭伟. 从城市更新理论看理论溯源及范式转移[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9-16. (ZHANG Tingwei. Theoretical root and paradigm shift: perspectives from reviewing urban redevelopment theori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1): 9-16.)
- [52] 张杨, 贾艳飞. 时间的空间化: 历史城市时空关系的研究路径: 基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7): 75-82. (ZHANG Yang, JIA Yanfei. Spatialization of time: a research approach to the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hip of historical citie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7): 75-82.)